

中国共产党 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为纪念建党 70 周年作

胡 乔 木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共产党 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为纪念建党70周年作

胡 乔 木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为纪念建党70周年作

ZHONGGUOGONGCHANDANG
ZENYANG FAZHAN LE MAKESIZHUYI

胡乔木

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重印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19,000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7月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400

ISBN 7-01-001108-7/D·367 定价 0.46元

中国共产党 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为纪念建党70周年作

胡 乔 木

中国共产党的70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地传播和实践的70年。人们今天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不能不注意它在中国的发展。确实,这个发展不但远远超出过去一般人的预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料不到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的今天,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因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又有相互勾结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是世界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国家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被广泛接受的重要条件。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有些国家也曾经历过很激烈的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马克思主义也曾经得到了

比较广泛的传播，但是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没有遇到过严重的困难和危险，它所以取得成功，除了由于党和在它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斗争形势，总结斗争经验，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并在斗争中立场坚定，组织严密，团结一致，勇敢顽强之外，在客观条件方面，我想还应该指出：第一，竞相争夺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长时期陷于自身相互间的尖锐的利益冲突，不可能对于中国革命的潜力和发展速度及时地作出恰当判断并采取统一政策和一贯步骤；第二，中国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表现为长期的军阀混战，加上中国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使革命力量有可能取得局部胜利并逐步壮大；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缺乏充分发展的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也受到限制，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因而深受压迫和贫穷折磨的中国人民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70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曲折前进和取得伟大胜利的70年。

党从创立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到国民党大规模反共，不到6年时间。1927年反革命势力的血腥恐怖似乎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了，但是百折不挠的共产党人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

现了。蒋介石对于这支力量的打击从未放松，但他所发动的“围剿”却连连失败。可是党内的“左”倾错误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并且在1934年的长征初期几乎使党陷于绝境。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到达陕北的几万人重新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党由于努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虽然没有放过一切可以重新扼杀共产党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没有力量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先后爆发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下，英美不得不与苏联同样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也终于不可能携手合作。一部分美国有远见的人士曾经企图改变美国政府的片面援蒋政策，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国政府竭力援助蒋介石重新发动内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已经成为巨人。它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和从大陆上赶走了美国政府装备和资助的蒋介石军队，建立了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40多年的历史远不是轻松的。西方列强长期封锁并以武力威胁中国，妄图把中国困死，直至70年代这个政策才彻底崩溃。即使在中国

建交以后，它们对中国的关系也充满了复杂性。西方始终有一股势力想通过种种方式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但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任何力量也推翻不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自己国家的工作中，尽管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总的说来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在 50 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 80 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现在的中国和以前已有很大不同，它已经实现了空前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已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国防实力，在国际事务中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都大大加快了。尽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名次还很低，但是它的综合国力已达到世界前十名之列。无疑，在中国实现了它的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以后，情况将有更明显的变化。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对前途充满信心。

中国共产党的 70 年历史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和它在 20 世纪的发展——列宁

主义基本原理的胜利。很明显，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组成新式政党以领导劳动人民实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这方面列宁的贡献特别丰富），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巨大鼓舞和直接声援，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可能有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党所领导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群众的长期斗争。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要在斗争中同其他有革命要求的阶级和其他可能联合的政治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并且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独立性的理论，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充满风险的两次合作，不可能有共产党与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长期合作。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发展自己的暴力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暴力，建立自己的专政（按照本国的情况，中国人把无产阶级专政先后改变成为工农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以摧毁统治阶级的专政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最终建立人民共和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发展经济的理论，人民共和国就

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使中国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

中国共产党的70年历史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成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确地宣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必然随着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世界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成功的运用，也必然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也必然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自的发展。中国是个大国，是个东方大国，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又是主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因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可能不是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获得重大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长时期内充满了关于是否把和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和探索，而为了把两者成功地相结合，就必然要在许多重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正是两者相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最早提出并一贯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一贯要求中国同

志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要从客观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努力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并且长期教育全党，使全党接受了他的这一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并一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现在，我们就中国共产党在哪些重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哪些发展简要地观察一下。

（一）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思想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党逐渐认识到，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首先领导农民在农村中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游击战争，进而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还是不可设想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要争取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西欧的农民（他们的情况跟中国的农民很不同）却缺乏革命的要求，而当时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又还没有

发展到东方。列宁提出了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注重领导农民革命斗争，但是列宁的党并没有领导农民斗争的足够的经验，十月革命的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由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宣布和实现的，而不是由农民通过自己的革命斗争实现的。真正解决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任务，不能不历史地落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共产党人身上。在1927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既不能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地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又不能通过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这种形势要求党非把主要的力量转向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不可。中国的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生活极端贫苦，有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毛泽东。他在领导秋收起义未能达到党所预定的夺取城市的目的之后，毅然决然地把失败了的队伍领上了湖南江西边界中段的井冈山，创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在理论上论证了在全国的反革命形势下为什么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以后，他又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领导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并且在理论上进一步指出这种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将可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实

现。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后，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终于胜利地发展成为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党究竟是依靠什么力量造成了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当然我们决不能忽视城市各阶层人民（以工人和青年学生为先锋）在开辟革命战争的“第二战场”中的作用，但是革命的主力，无疑是接受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亦即贫农和它的同盟军中农。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里成功地解决了革命基本动力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坚定地依靠农民并给农民以革命政治教育和严格组织训练的问题。党把如此众多的出身小生产者的农民在斗争中教育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和坚定的党的干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的迫切要求土地和其它生活权利、贫苦而缺少文化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竟可以激发出如此伟大的革命潜力，可以组织成如此有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可以经受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所施加的如此长时期、大规模的围攻和迫害，可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也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

(二)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创造性思想。农民的土地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同有一支由党所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分不开的。当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时，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真理的人，因为历史上很多统治者或统治地位的追逐者都懂得它，历代农民起义的领导者 and 组织者都懂得它，欧洲有工人武装起义传统的党也曾经懂得它，而且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曾领导过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他只是在当时不与国民党争军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第一个说出了这个真理。蒋介石的反面教员的作用教育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拿起了枪杆子，同反革命作斗争。中国成立了工农红军。红军的名字是从俄国学来的，但是中国红军是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由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与俄国红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由上而下成立起来的情况很不相同，由此也就产生了中国人民军队独立形成的一系列至今在世界上少有的特点。毛泽东把红军的性质规定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他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否则

“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红军既是这样的组织，就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就必须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争取敌军的原则，就必须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就必须遵守最严格的群众纪律，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时时处处为群众服务，而且要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进行各种革命斗争。党在创建武装力量和领导武装斗争中，实行并坚持了诸如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机关等一系列重要制度，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红军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忠实工具，从而科学地规定和处理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军队的关系。这样，红军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武装力量。红军后来改名八路军、新四军，后来又改名人民解放军，军队的环境尤其在建国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建军的根本原则却没有也不容许有任何变化。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始终是人民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是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部队长期驻守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边防地带，帮助驻地（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海岛）的建设，发展和维护广大高寒地区的交通运输，他们默默地克服着

常人所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危险、痛苦和困难，包括必要时击退侵略者的挑衅和入侵，不屈不挠地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宁奉献着一切。人民解放军经常担负着繁重的训练、建设和生产的任务，经常出现在一切发生巨大的自然灾害或人民迫切要求紧急援救的地方，而且经常地在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同各族人民一起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解放军中大量涌现雷锋式直至苏宁式的既尽忠职守又忘我地为群众为战友服务的英雄模范人物不是偶然的。由于具有同人民群众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我军在军事上就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套战略战术使我军在十年内战时期和八年抗战时期得以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而在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得以迅速地最终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多万军队，比预计的时间更早地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任务。这种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内容，随着战争形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十年内战时期的战略，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加以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作出规定；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曾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当然，将来可能发生的强加于我国的战

争，由于战争条件和军事技术的不同，一定会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产生更多的新的变化。我军在现阶段所紧张进行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正是瞄准着风云变幻的未来世界的。但是如同我军是人民军队这个根本特征不会变一样，我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个根本特征也不会变。人民军队这个关于武装力量的新概念，它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新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战争所形成的战略战术的新特点，不但在革命史、军事史和军事学上有其伟大的意义，而且在国家发展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三）在与其他政治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创造了独特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策略原则。革命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革命发展的特定的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统一战线，这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见。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写着：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等等。但是历史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的成功经验确实是不多。在中国共产党怎样与国民党建立或保持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就往往（不是全部）是不中肯的甚至是错误的。这

种指导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归于失败(当然,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主义的领导仍然要负主要责任),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中也曾造成一个时期的混乱,只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抵制,才避免了这种混乱的发展。抗日战争的八年是国共两党既合作而又尖锐冲突的八年。这次国共合作不同于西欧国家共产党与社会党所曾形成过的合作(当然国民党也不同于社会党),一则这种合作没有正式的书面的协定,没有一定的规章可循;二则这种合作是两个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和政权的政党之间的合作,而且一方居于中央政府的地位,还采取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另一方既不被承认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又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地方政府的范围。后者的力量远弱于前者,而在政治上远强于前者,它必须在斗争中求生存,而又确能在斗争中求发展。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形势中求发展,这首先是因为国共两者的团结是为了共同抗日,在它们两者之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在日本占领区(敌后)共产党大有发展的余地;其次还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国共两者之外还有一个中间派,而中间派正是共产党所必须争取和可以争取的同盟军。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了和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形势,提出